

# 澳門人身份認同研究 ——與香港比較

● 王佳煌、詹傑勝

**摘要：**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研究議題，目前已有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學者及研究機構長期的問卷調查，也有為數甚多的研究論著，理論、觀點相當多元。相對地，澳門人身份認同的民調與研究論著較為稀少，香港人與澳門人身份認同的比較研究，自然也不多見。因此，本文透過民調與統計分析的探索研究，了解澳門人身份認同的輪廓與特質，並與香港的民調資料比較，刻劃澳門人身份認同的內涵。研究發現，澳門人自認為中國人、以中國人為主認同的二元認同，以及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符號的接受度，比例上都高於香港人。未來的研究可以試圖尋找這些差異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關鍵詞：**澳門人 身份認同 民族主義 國家認同 香港人

## 一 導言

自中英兩國於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以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本土意識即成為學者研究的重要議題<sup>①</sup>。近年來有關本土意識的論著中，最著名的就是香港學者陳雲（本名陳云根）的《香港城邦論》，強調香港的城邦格局和本土自治的訴求<sup>②</sup>；香港大學學生會試圖發展「香港民族論」，提出香港人與中國人有別的論述<sup>③</sup>；民間歷史學者徐承恩認為「香港民族」有四千年的歷史根源<sup>④</sup>。至於反對全國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與香港特區政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策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領

\* 本文為台灣科技部補助研究計劃經費部分研究成果，謹此感謝。計劃編號：104-2410-H-155-017-MY3。

導，其後成立政團「香港眾志」，以及提出「佔領中環」運動的「佔中三子」朱耀明、戴耀廷、陳健民，政治立場則偏向民主化，較少觸及國族認同或香港獨立的議題，但他們的「民主自決」訴求因不排除港獨選項，仍往往被視為支持港獨<sup>⑤</sup>。

相對而言，澳門回歸前後雖然也有社會與政治的矛盾，包括老移民（數代之前或更早移居澳門的移民後代）與新移民（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從中國大陸移居澳門工作的移民）、社會階級、華人與土生葡人之間社會文化與經濟地位的差異，但似乎沒有形成強烈對抗與衝突的本土意識。學者對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研究並不多見（結合問卷調查分析的尤其稀見），可與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今香港民意研究所）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電話問卷調查及研究相對照者也不多。本文於2017年對澳門居民所做的隨機抽樣電話問卷調查及相關的分析，希望能補足這一塊研究空缺，擴展「澳門學」（Macau Studies）的研究。澳門學是以澳門的後殖民歷史過程、地理空間與人民日常生活為基礎的跨學科本土知識體系，借助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論，試圖建構、發展與傳遞具備全球意義的本土知識，反映邊緣地區對殖民主義及其影響的反抗與批判性思考<sup>⑥</sup>；身份認同是個人與集體自我（selves）定位的根本，理應成為澳門學研究的一部分。

關於「身份認同」一詞的定義，英文的“identity”兼有身份、特性與同一之意，是一種自我的社會—心理建構與定義，建立在「我（們）是誰？」，以及認同「同」與別「異」的社會分類之上。「自我確認」（identification）則是個人或群體感受自我與其他主體之間有無關聯，有無相似、相異之處，並相互聚合互動或區別分隔的過程。群體認同牽涉到權力關係，亦即不同社會群體因為資源分配與刻板印象（如歧視）所造成的內部壓迫結構與外部鬥爭<sup>⑦</sup>。例如，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或國族認同，是以國家或民族為對象的集體認同，依據歷史、血緣、社區、生活空間、文化、風俗習慣等面向，區別「自我」與「他者」，以建構民族或國族集體人格的特質與群體差異的論述（或意識形態）<sup>⑧</sup>。集體的身份認同往往是多重的：垂直的多重認同，即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之下還有不同層次的認同，如城市、地域、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形成一國之內或跨國（如歐洲聯盟）之間不同空間層級的嵌套認同（nested identities）；水平的多重認同，則是指某個族裔的認同與所處國家的身份認同並置，或是「邊陲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亦即既認同自己是某個國家的人民，又有強烈的地區或區域認同，如拉丁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等。垂直或水平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和諧、相容的，也可能是衝突、矛盾的（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sup>⑨</sup>。一旦身份認同有矛盾，輕則造成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重則造成社會衝突、分離主義與統獨之爭。

在本節簡單說明研究目的、「身份認同」的定義及有關研究在政治、社會上的重要性之後，第二節將簡述過去有關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研究文獻；第三節首先說明本調查的資料來源與方法（包括抽樣方法、調查內容），之後描述統計，兼與香港學界的調查發現相互比較；第四節是推論統計與研究發現的討論；第五節綜述本文重點，說明研究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展望。

## 二 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相關研究

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研究最早是《文化雜誌》1994年刊發的「澳門土生人」專輯，如阿馬羅 (Ana Maria Amaro) 提出的土生葡人研究，包括家族與人口歷史資料、人類生物學資料、飲食與服飾等人種學資料，並對土生葡人在澳門回歸後將面對的困境作出展望<sup>⑩</sup>。張虎提出的論述主題涵蓋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以及土生葡人中產階級、公務員的「三化」(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與去留問題<sup>⑪</sup>。繼承以土生葡人作為研究對象的思路，周大鳴、李居寧探討澳門回歸後土生葡人的族群認同與調適問題<sup>⑫</sup>；科斯塔 (Francisco Lima da Costa) 以「認同資本」的概念，論述澳門土生葡人種族認同(無國家民族的種族認同)的形成、轉變與邊界問題<sup>⑬</sup>。

黎熙元指出，澳門人文化認同不易表述的原因，在於中葡的反殖民與殖民政治話語長期在各自社群中主導歷史敘事，加上澳門存在特殊的社會結構，包括華洋分治、集團壟斷(博彩業與企業)和社群隔離(華人社團、街坊會 vs. 土生葡人)，因此後殖民時代的澳門政府需要「在混亂中梳理和尋找」在地居民所接受的文化認同<sup>⑭</sup>。回歸後澳門政府在建構國族認同、統合文化認同方面的嘗試，成為一些學者研究的焦點：仇國平比較回歸後香港與澳門建構國族認同政策的歷史和社會脈絡，特別重視兩地政府將經濟實用主義與國族認同掛鉤的情況<sup>⑮</sup>；林蔚文解讀回歸後澳門政府的官方文本，認為政府建構的身份認同結合了在地小鎮社區文化、殖民時代歷史遺產、中國國族主義與國際化的意象，糅合出混種的、後殖民的、多元的認同，這種認同基於務實的考量，將澳門建構為中國與葡語世界(葡萄牙與前葡屬殖民地)外交與經貿合作交流的平台<sup>⑯</sup>。

馬寶康 (Malte P. Kaeding) 在論述澳門的發展歷史與社會脈絡時，基於對五十九名澳門大學學生作出的先導性調查，發現澳門雖然有長達450年的殖民地歷史，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根本上仍是族裔文化的身份 (ethno-cultural identity)，即中國人這一身份。隨着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教育普及，澳門特區政府倡導下的公民認同 (civic identity) 漸具雛形，但未來發展相當困難，要視乎澳門人的政治參與，以及新移民融入澳門的程度<sup>⑰</sup>。

仇國平透過闡述澳門現代政治史，指出澳門人更傾向接受中國人身份的一些原因：第一，在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之後，殖民政府喪失對澳門的治理能力與意願，親中共的政治勢力排除親國民黨勢力，並滲透所有市民社會的領域或部門。第二，年輕人在學校所受的教育深受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殖民政府對各級學校沒有統一的課綱版本，無法促使學校教育與課程產生在地的、一致的澳門認同。第三，回歸之後，2006年被揭發的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與澳葡政府的貪腐問題一脈相承，反而讓民眾更傾向信任北京而非特區政府。第四，澳門的民主派人士能夠得到的支持極為有限，主因在於中共勢力滲透市民社會各個角落，包括文官體系、工商界和中小企業。民主派議員在2009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只贏得三成票數與不到兩成的議

席，所提議案從未獲得通過。第五，電視台與廣播電台都是由政府所有，新聞傳播媒體對政府的監督不強，新聞報導多半是官方新聞稿的複製；中共介入新聞傳播媒體的程度也很深，如《澳門日報》是由共產黨領導於1958年在澳門創辦的，比較像是官方喉舌。第六，澳門缺乏在地流行文化，主要是接受香港的流行文化。這些因素加總起來，使得澳門人比香港人更傾向接受中國人的身份認同<sup>⑩</sup>。

邵宗海、李雁蓮透過澳門、台灣的社群比較分析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可與上述研究互為佐證。研究指出，葡萄牙人自1553年殖民澳門以來，從未試圖透過通婚、入籍等方式強制將澳門人同化，反而是將澳門人長期隔離：澳門人中擁有葡萄牙國籍的僅有1.7%；漢語與葡萄牙語同為官方語言，但廣東話仍為民間主流語言；社會紛爭的解決主要依照在地風俗習慣。晚清時期葡萄牙人誘拐大量華人到海外工作，女性被迫賣淫，引發在地華人的反感與反制保護，令華洋隔膜更為嚴重。這些歷史、文化與政治因素，在在減少澳門人國族認同衝突的可能性：澳門人內部的衝突，主要是中國大陸地域認同矛盾或衝突的延伸，而非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矛盾或衝突。例如，澳門立法會十四席由直接選舉產生，選舉動員以血緣、地緣、籍貫為基礎（如立法會議員及其支持者已經形成「福建幫」），並非以國族（中國 vs. 葡萄牙）為基礎。雖然老移民與新移民之間有矛盾，但並不像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那麼巨大，至少國族認同的問題不尖銳。從大陸移居澳門的新移民多數為非技術性勞工，居住地區與老移民各有區分；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新移民住在較為高級的住宅區（如黑沙環），原來族群的居住群聚（如福建人集中在北區）加上階級群聚（如中上階級集中在氹仔、高士德），形成較為複雜的居住模式，但這種居住模式並未導致全面的族群、階級矛盾或國族認同矛盾<sup>⑪</sup>。

董致麟研究中國大陸移民在澳門社會中的身份認同，也得出相似結論。他指出澳門歷史上各個時期（從澳葡政府的華洋分治到回歸後以華人主導），大陸移民的政治認同或國族認同較為單一，文化認同和主流語言以中國文化與廣東話為主，社會認同仍普遍為移民心態，經濟認同則在回歸前後隨着博彩業與觀光旅遊業發展逐步提升。回歸之前，澳門社會並不排斥移居澳門的大陸移民，但廣東話語族與「福建幫」之間的矛盾值得注意。回歸之後，來澳門工作的新移民雖能補充本地基層勞工人數的不足，但也讓部分澳門人反感，有些人認為他們來搶走工作、薪資未用於本地消費；另一方面，大陸移民（不少是高階的勞工或工作者）也不認為自己是澳門人，他們來置業移民，固然提供了澳門所需的專業技術與資金，但這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大陸移民多住在黑沙環等高級住宅區，也與本地人形成相當程度的居住隔離，不過這些隔離並未上升到國族認同衝突的層面<sup>⑫</sup>。

然而，李展鵬最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指出澳門人身份認同已在近二十年的社會變遷與文化過程中開始浮現：澳門《基本法》中的「澳人治澳」概念，成為澳門人主體認同的法律基礎；澳門歷史城區在2005年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凸顯澳門身份的歷史文化基礎。博彩與觀光旅遊業迅速發展，大量遊客對經濟與日常生活的衝擊，也逐漸強化澳門人

與「他者」的區分。高官貪污與「反離補」運動、「小潭山事件」、「我愛澳門」話語的出現，象徵民間社會相對於國家機器的自主意識萌芽成長；社會經濟情境劇變也引發懷舊風潮與本土文化保育運動（藍屋仔、東望洋燈塔）；「你不是澳門人」的排外意識、港澳罵戰的矛盾，使得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更讓人關注。他最後的結論和展望是：澳門的定位本來就是邊緣外的邊緣，未來澳門人身份認同應該秉承過往的混雜與模糊，適度留白，更加包容，填入更多可能性<sup>⑳</sup>。

澳門的傳統媒體向來被親中力量壟斷，但隨着新媒體興起，年輕網民開始以網絡為媒介發表不同聲音，為一些學者所注意。林仲軒採用民族志研究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澳門網民如何在網絡上抵抗官方主導的「愛國愛澳」支配性論述與國族認同，並表演其認同，建構其本土意識。這種建立在社交媒體 Facebook 與討論區的網絡社群、群組的本土意識，既有強烈的「我群—他者」區分，也有專注於集體回憶與懷舊情緒。年輕網民更透過在地的社會運動，實驗建構新的認同<sup>㉑</sup>。王紅宇對澳門一所公立大學修讀必修通識課程的大二、大三學生做抽樣問卷調查（佔總人數的六分之一），蒐集受訪者接觸傳統媒體（電視、報紙）與新媒體（Facebook、微博）新聞與其國家認同之間關係的統計資料，發現他們傾向接觸新媒體而非傳統媒體的新聞；在這些受訪者中，較多接觸 Facebook、微博的受訪者分別有着較弱、較強的國家認同<sup>㉒</sup>。

上述研究均有助於我們初步了解澳門人身份認同的歷史由來和發展，以及學者對相關話題的討論，可與本文的抽樣電話問卷調查及研究結果互為對照、補充，以求得出更全面的圖像。

### 三 資料來源、方法與描述統計

本文所使用的電話訪問資料「澳門居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係委託澳門民意調查機構「易研方案」下設的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於 2017 年 1 月 21 至 22 日進行，問卷題目參考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歷年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卷題目設計，以利後續比較與討論。調查方法是採取隨機抽樣的電腦輔助電話調查（CATI），進行「雙層抽樣」，即先依據全澳住宅電話庫隨機組合、抽樣，再於戶內依「最近生日法」（即生日超過六個月要加一歲）作受訪者抽樣；訪問對象必須為年滿 18 歲以上的澳門本地居民。我們共取得 351 份有效樣本，抽樣誤差為 5.34%<sup>㉓</sup>。

問卷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分為兩部分：(1) 描述統計的部分以圖表為主，包括澳門受訪者認同澳門、中國的狀況，以及對澳門、中國政治與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並參考香港類似調查的主要發現與政府統計資料，相互比較。(2) 推論統計的部分則是進行邏輯迴歸分析，並加以討論。

樣本中的性別比例方面，女性受訪者佔 59.54%，男性受訪者佔 40.46%，女性比例較高；年齡方面，平均年齡 47 歲，最小 18 歲，最長者 92 歲。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形上，大專或本科學歷的比例最高（33.24%），其次分別是高中學

歷(26.24%)、小學以下(20.12%)、初中(18.08%)，研究所學歷的比例最低(2.33%)。整體而言，專上學歷佔受訪者35%左右，比例不算低。主觀社會地位方面，儘管多數受訪者月收入較低，亦多為無業、家管、學生等，但仍以自認中產階層者最多(40.60%)，其次是中下階層(34.63%)，再次是低下階層(19.40%)，中上階層和上等階層的受訪者，比例僅5.37%<sup>28</sup>。

### (一) 澳門人、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

如表1所示，單一認同的澳門受訪者中，以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例較高(22.5%)，澳門人稍低(17.9%)。整體而言，二元身份認同的比例較高，以澳門人為主認同的比例最高(29.9%)，但以中國人為主認同的比例亦不遑多讓(28.2%)。

表1 澳門人的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	人數	比例(%)
澳門人	63	17.9
中國人	79	22.5
澳門人，但也是中國人	105	29.9
中國人，但也是澳門人	99	28.2
以上都不確定	4	1.1
不知道/很難講	1	0.3
總計	351	100.0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統計。

對照表2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歷年調查資料，可以發現港澳居民身份認同的明顯差異。在1990年代，單一認同香港人身份的受訪者比例與單一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不相上下，在1997和2008年，後者甚至高於前者。但是近年來，認同香港人身份的受訪者多半高於認同中國人身份，前者從2010年的17.2%升至2016年的24.0%，後者則從16.4%降至12.2%，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甚至跌到有統計以來最低的8.8%；2012、2014、2016年兩者相差至少十個百分點。本文的調查則顯示，2017年澳門單一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受訪者，多於單一認同澳門人身份者，並且遠高於香港近年來的比例。

二元認同方面，香港居民以香港人為主認同的比例，始終遠高於以中國人為主認同的比例，前者從1990年代的三成以上漸增到2010年以後的四成以上，後者雖然也有所增加，但幅度較小，從1996年的14.7%漸增到2008年的24.9%。相對地，澳門居民以澳門人為主認同和以中國人為主認同的比例不相上下。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做的定期調查系列「澳門週年調查」，並無上述的四類身份認同選項，受訪者只以0至10分表示自己對中國人、澳門人的身份認同。2017年的調查(共500份樣本)發現，自認為澳門人的平均分為8.0分，

表2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年份	香港人 (%)	係香港人，但都係中國人 (%)	係中國人，但都係香港人 (%)	中國人 (%)	其他 (%)	總和 (%) (N)
1996	25.2	32.9	14.7	25.7	1.5	100 (769)
1997	23.2	31.8	11.6	32.1	1.3	100 (302)
1998	28.8	30.0	15.6	24.5	1.2	100 (527)
1999	22.8	35.8	17.0	23.5	0.9	100 (533)
2002	24.8	36.0	14.5	23.6	1.1	100 (500)
2006	21.4	37.9	21.1	18.5	1.1	100 (1,013)
2008	16.7	39.8	24.9	17.7	0.8	100 (1,014)
2010	17.2	43.9	21.8	16.4	0.6	100 (941)
2012	23.3	41.6	22.0	12.5	0.6	100 (819)
2014	26.4	41.3	22.0	8.8	1.6	100 (810)
2016	24.0	42.8	19.9	12.2	1.1	100 (803)

資料來源：〈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調查結果〉，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網，[www.com.cuhk.edu.hk/ccpos/b5/research/Identity\\_Survey%20Results\\_2016\\_CHI.pdf](http://www.com.cuhk.edu.hk/ccpos/b5/research/Identity_Survey%20Results_2016_CHI.pdf)。

說明：(1)總和不包括部分回答、「不知道/無答案」的受訪者；(2)2006年之前的資料未經加權處理。

自認為中國人的平均分也是8.0分。自2007年該系列調查展開至2018年結束，自認為澳門人的平均分在7.7至8.3分之間，自認為中國人的平均分處於7.6至8.5分之間，兩者均穩定地維持高分，這表示受訪者對兩種身份認同度都很高<sup>26</sup>。這項調查的發現與本文的調查發現有相互呼應之處，也與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發現形成強烈對比，香港近年來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度有所下降的情況，在澳門似乎並沒有出現。

澳門人與香港人在身份與國家認同上的差異，或許與居民出生地有密切的關係。表3顯示澳門居民在外地出生的人數中，中國大陸出生者在2001年

表3 澳門居民外地出生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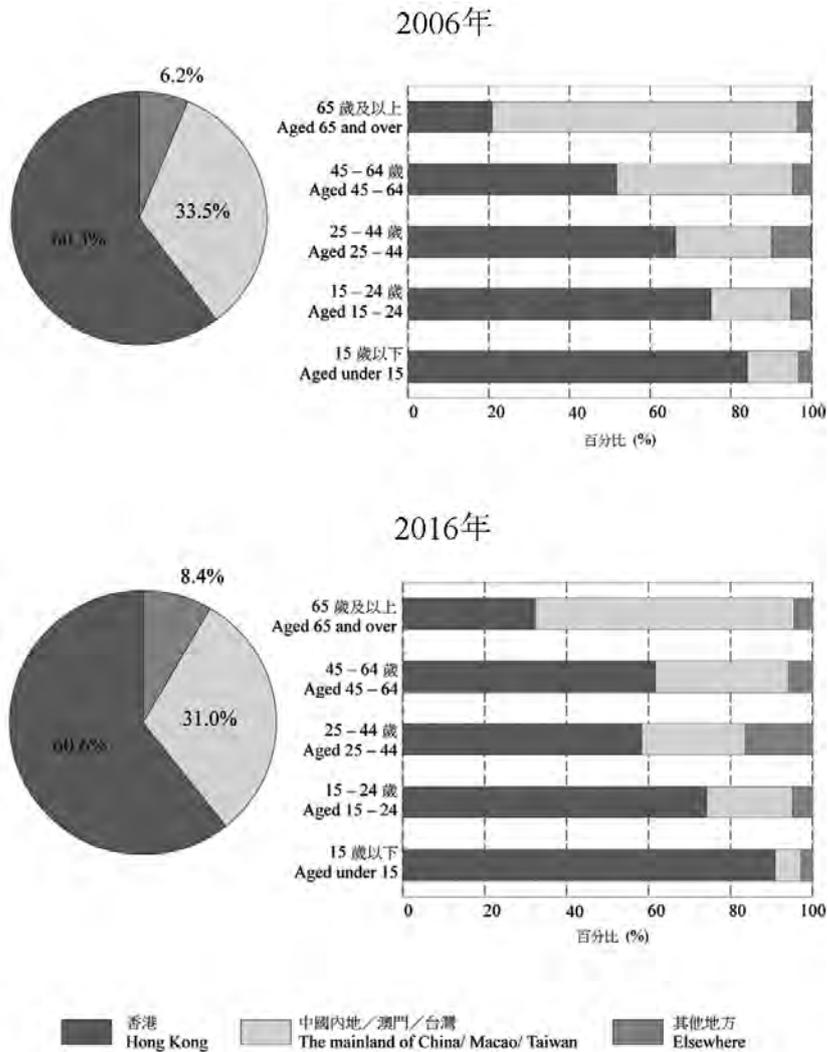
出生地	2001		2011	
	總數	比例 (%)	總數	比例 (%)
中國大陸	198,921	81.9	255,334	78.3
香港	17,841	7.3	23,673	7.3
菲律賓	5,221	2.2	13,518	4.1
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	13,941	5.7	25,266	7.8
葡萄牙	1,746	0.7	2,202	0.7
其他國家或地區	5,156	2.1	5,899	1.8
總計	242,826	100.0	325,892	100.0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編：〈2011人口普查詳細結果〉(2012年4月)，[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564633df-27ea-4680-826c-37d1ef120017/C\\_CEN\\_PUB\\_2011\\_Y.aspx](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564633df-27ea-4680-826c-37d1ef120017/C_CEN_PUB_2011_Y.aspx)，頁16。

約佔 81.9% (佔總人口的 45.4%)，2011 年雖然微降到 78.3% (佔總人口的 46.5%)，但比例仍遠超過在其他非澳門地區出生的澳門居民；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總數在十年間有所提高。

相對地，香港人口早期多數是從中國大陸遷移來的，但經過幾個世代，新生代的香港居民土生土長，對中國的認同自然比較低。據圖 1 顯示的香港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在中國大陸/澳門/台灣出生的人口比例從 2006 年的 33.5% 下降到 2016 年的 31.0%。愈年輕的年齡組，在香港出生的比例愈高，這一趨勢隨時間推移日益明顯：2016 年 65 歲及以上人口在香港出生者佔該年齡組人口 32.4%，15 歲以下人口在香港出生的比例達 90.9%，遠高於 2006 年的 20.8% 和 84.1%，主因之一是大陸新來港兒童減少，反映出香港男性與大陸女性跨境婚姻減少的趨勢。25 至 44 歲人口在香港出生的比例低於 45 至 64 歲人口，這是因為該年齡組包含大量外籍家庭傭工<sup>②</sup>。

圖 1 香港居民出生地統計



資料來源：〈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揭示最新人口趨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網，[www.byccensus2016.gov.hk/tc/bc-snapshot.html](http://www.byccensus2016.gov.hk/tc/bc-snapshot.html)。

整體而言，澳門人口中在中國大陸出生的比例約在八成上下，而香港人口中在香港出生的比例佔六成左右，在大陸、澳門和台灣出生的比例，加起來才佔三成。現有統計資料並未顯示在大陸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是出生後即移居到港澳，又有多少是在大陸生活到一定年齡後到港澳升學或工作。但我們可以由此合理推斷，是否在大陸出生的因素，與港澳不同調查中有關中國國家認同的差異，應該有相當的關係。前述馬寶康的先導問卷調查與王紅宇對澳門一所大學修讀通識課程學生的抽樣調查，也發現在大陸出生與中國國家認同之間有正相關的關係<sup>29</sup>。本文的調查未能顧及新舊移民、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等相關議題與身份認同的關係，有待日後作進一步的補充探討。

## (二) 澳門人、香港人對中國與澳門/香港政治及文化符號的自豪感

表4顯示澳門受訪者對中國、澳門各種政治和文化符號的「自豪分數」（即對它們感到自豪的分數，在1至5分中，以4或5分代表感到自豪），平均分數以文化符號較高，如廣東話（4.35分）、萬里長城（4.36分）；受訪者對澳門政治符號的自豪分數，如澳門特區政府（3.58分）與特區區旗（3.93分），反而不及中國政治符號那麼高，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4.12分）與國歌（4.16分）。整體而言，受訪者對中國和澳門這些政治和文化符號多給3分以上，給5分比例超越五成以上的包括國旗、國歌、萬里長城和廣東話。

表4 澳門受訪者對中國、澳門政治與文化符號的自豪分數

政治與文化符號	平均分數	人數與比例(%)	評分					不知道/ 很難講	總計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4.12	人數	10	19	71	<b>60</b>	<b>178</b>	11	349
		百分比	2.9	5.4	20.3	<b>17.2</b>	<b>51</b>	3.2	1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4.16	人數	13	11	72	<b>59</b>	<b>187</b>	7	349
		百分比	3.7	3.2	20.6	<b>16.9</b>	<b>53.6</b>	2	100
人民解放軍	3.88	人數	16	29	76	<b>63</b>	<b>143</b>	22	349
		百分比	4.6	8.3	21.8	<b>18.1</b>	<b>41</b>	6.3	100
萬里長城	4.36	人數	5	10	41	<b>75</b>	<b>193</b>	26	350
		百分比	1.4	2.9	11.7	<b>21.4</b>	<b>55.1</b>	7.4	100
普通話	3.70	人數	16	25	103	<b>85</b>	<b>102</b>	19	350
		百分比	4.6	7.1	29.4	<b>24.3</b>	<b>29.1</b>	5.4	100
廣東話	4.35	人數	4	10	47	<b>85</b>	<b>199</b>	6	351
		百分比	1.1	2.8	13.4	<b>24.2</b>	<b>56.7</b>	1.7	100
澳門特區政府	3.58	人數	24	33	99	<b>91</b>	<b>93</b>	11	351
		百分比	6.8	9.4	28.2	<b>25.9</b>	<b>26.5</b>	3.1	100
特區區旗	3.93	人數	5	20	93	<b>94</b>	<b>124</b>	15	351
		百分比	1.4	5.7	26.5	<b>26.8</b>	<b>35.3</b>	4.3	100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統計。

對照表5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關於香港受訪者對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即在自豪分數上給予4分或5分的受訪者比例)的民調資料,可以發現澳門居民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遠比香港要高。例如,香港受訪者對國旗、國歌的自豪程度,最高才超過五成(2008和2010年),澳門則在七成上下。澳門給予人民解放軍4至5分的比例將近六成,香港最高也不過三成左右。對於萬里長城,香港的自豪程度於2010年以前長期在七成以上,之後跌到六成以下,2016年為54.5%,澳門2017年則在76.5%。澳門人對特區政府、區旗的自豪程度,分別在五成、六成以上;相對而言,香港人對政府總部、徽號/區旗的自豪程度,歷年來最高也不到四成。

表5 香港受訪者對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

政治與文化符號	1996	1997	1998	1999	2002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國旗	30.6	30.1	24.9	29.9	31.1	47.6	53.4	52.7	37.8	29.5	36.9
國歌	39.1	40.1	28.3	36.0	38.1	48.2	53.0	54.8	36.4	31.8	36.1
人民解放軍	10.0	13.6	13.7	16.5	18.9	28.8	29.6	33.5	21.6	17.4	22.8
萬里長城	77.9	78.8	74.0	78.5	79.3	73.3	74.2	71.3	60.6	50.9	54.5
普通話	18.6	21.3	19.0	28.0	25.2	34.0	30.4	28.5	22.5	16.7	17.8
廣東話	-	-	-	-	-	-	-	-	55.5	58.7	65.2
政府總部	-	-	-	-	-	-	-	-	18.2	14.5	21.3
徽號/區旗	12.0	29.2	16.3	18.3	19.3	29.2	37.2	39.1	36.6	26.1	34.8

資料來源：〈香港人的身份與國家認同調查結果〉，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網，[www.com.cuhk.edu.hk/ccpos/b5/research/Identity\\_Survey%20Results\\_2016\\_CHI.pdf](http://www.com.cuhk.edu.hk/ccpos/b5/research/Identity_Survey%20Results_2016_CHI.pdf)。

說明：2006年之前問「區旗」，之後改問「徽號」。

表6呈現澳門受訪者對廣東話與普通話的抗拒程度：抗拒廣東話的比例很低，最強烈抗拒(5分)的受訪者比例，只佔受訪者1.73%；反之，最不抗拒廣東話的(1分)高達77.17%。其他抗拒程度(從2分到4分)的比例也都在10%以下，分別只有8.96%、9.83%及2.31%。

表6 澳門受訪者抗拒廣東話與普通話的程度

抗拒程度	廣東話	普通話
1分	77.17	52.69
2分	8.96	17.96
3分	9.83	21.26
4分	2.31	4.19
5分	1.73	3.89
比例(%)	100	100
受訪者總數	346	334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統計。



澳門人身份認同已在近二十年的社會變遷與文化過程中開始浮現。(圖片由黃文輝提供)

相對地，澳門受訪者抗拒普通話的程度，代表最低抗拒程度的1分比例最高，佔52.69%，不如廣東話的77.17%；其次是3分的比例，佔21.26%；第三高的是2分，佔17.96%。至於代表最高抗拒程度的4分與5分比例不高，各佔4.19%與3.89%。由此可見，澳門受訪者對廣東話的接受程度明顯高於對普通話的接受程度，抗拒廣東話的程度也遠低於抗拒普通話的程度。香港的情況也較相似：香港亞太研究所2016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抗拒普通話的比例比澳門稍高(14.4%)，樂於使用的也不多(14.3%)<sup>29</sup>。這些調查結果顯示，港澳居民的語言認同有相當強烈的地域性。

#### 四 推論統計與研究發現

本節依據電話訪問蒐集的樣本，以邏輯迴歸模型檢驗不同社會人口變項、態度變項，以及跟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關聯性。我們以「澳門認同」當作依變項，以「是否認同澳門」作為是與不是的二分類選項；「澳門人」和「澳門人，但也是中國人」這兩類合併為一類，作為比較傾向認同澳門；「中國人」和「中國人，但也是澳門人」合併為一類，作為比較傾向認同中國；排除回答「以上都不確定」、「不知道/很難講」的五名受訪者。在有效答題的346名受訪者中，48.55%的受訪者回答比較傾向認同澳門，51.45%受訪者則否。

##### (一) 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邏輯迴歸分析

表7呈現澳門人身份認同的兩個邏輯迴歸模型。模型1先檢驗社會人口、社會經濟變項，模型2再加入態度變項，並控制社會經濟變項，以了解不同自

變項是否與澳門人身份認同有顯著的關聯。各個模型也都經過檢驗，每一個統計模型中每個自變項的容忍值也都大於0.3，由此確認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不會高估自變項的統計顯著性。

表7 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邏輯迴歸模型

澳門認同	模型1	模型2
	勝算比	勝算比
<b>個人社會經濟變項</b>		
年齡	0.9729**	0.9841
男性	0.7243	0.8316
教育程度	1.1459	1.1363
主觀社會地位	1.3340†	1.4894*
<b>態度變項</b>		
以廣東話自豪		1.8070**
以普通話自豪		0.6988†
抗拒廣東話		0.9774
抗拒普通話		1.1739
喜歡澳門		1.2626*
喜歡中國		0.7581*
以人民解放軍自豪		1.4584*
以萬里長城自豪		0.6256*
以澳門政府自豪		0.8368
以特區區旗自豪		0.9186
截距	1.3738	0.8587
Log likelihood	-167.3834	-146.69736
Pseudo R <sup>2</sup>	0.0880	0.2007
N	265	265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統計。

說明：†P < 0.10; \*p < 0.05; \*\*p < 0.01；雙尾檢定 (two-tailed test)。「喜歡澳門」變項之資料來自問卷題項：「請問你覺得自己愛唔〔不〕愛澳門呢？」「喜歡中國」變項之資料來自問卷題項：「請問你覺得自己愛唔〔不〕愛國呢？」

模型1探討個人的社會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項對於澳門認同有沒有影響。我們發現，年齡、主觀社會地位兩個變項對澳門人身份認同有顯著的影響，性別與教育程度則無顯著影響。勝算比顯示年齡對於澳門認同有負面影響，即受訪者年齡每增加一歲，認同澳門的機率便減少2.71%。主觀社會地位對澳門認同則有稍微顯著的正面相關，即主觀社會地位每增加一個等級，認同澳門的機率就增加33.40%。

模型2加入態度變項。原本在模型1中顯著的年齡變項，在控制其他態度變項之後，不再顯著；原本稍微顯著的主觀社會地位，則更加顯著：主觀社會地位每增加一個等級，認同澳門的機率就增加48.94%。在新增的態度變項

方面，其中以廣東話的自豪分數與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相關性最高也最顯著，廣東話的自豪分數每增加一分，認同澳門的機率就會增加80.70%。反之，以普通話自豪與澳門認同呈現微弱的負相關，普通話的自豪分數每增加一分，對澳門的認同機率就會減少30.12%。

對澳門政治和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喜歡澳門)也會增加澳門人身份認同，自豪分數每增加一分，認同澳門的機率就會增加26.26%；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喜歡中國)則會減少澳門認同，自豪分數每增加一分，認同澳門的機率就會減少24.19%。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符號對澳門人身份認同的影響不一，如對人民解放軍感到自豪，與澳門人身份認同呈現正相關，人民解放軍的自豪分數每增加一分，認同澳門的機率便增加45.84%；萬里長城的自豪分數與澳門人身份認同呈現負相關，每增加一分，認同澳門的機率便減少37.44%。增加態度變項之後，Pseudo R<sup>2</sup>顯示解釋力從模型1的0.088，大幅增加到0.2007，而且多個態度變項呈現相當高的顯著水平。由此觀之，對中國、澳門政治和文化符號的態度與澳門人身份認同高度相關，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社會經濟變項的相關性不及態度變項高。

整體而言，主觀社會地位、以廣東話自豪，以及喜歡澳門、對人民解放軍感到自豪，與澳門人身份認同有顯著正相關；喜歡中國、以萬里長城自豪、以普通話自豪，則與澳門人身份認同有負相關，其中以普通話自豪的統計顯著性稍低。從這些變項來看，客觀與主觀社會地位較高者，以及與澳門屬性有關的特徵(廣東話)，與澳門人身份認同比較容易有正向顯著相關。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人對解放軍自豪程度低，解放軍駐港部隊甚至因為近乎封閉的管理形式而被香港媒體稱為「隱形部隊」<sup>⑩</sup>，但在澳門人當中似乎未有這一現象，對解放軍的自豪程度還加強了本土認同。這一問卷調查在2017年8月解放軍入澳救助「天鴿」風災之前進行，反映這一傾向並非在該事件發生後才開始出現，一定程度上說明澳門人在澳門與中國的分界上遠不如香港人清晰。

## (二) 研究分析

綜合上列描述統計與推論統計的發現，從描述變項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人傾向認同澳門的比例，只稍微高於傾向認同中國，本土意識並未明顯高於國家意識，這或許是因為澳門回歸至今年已經二十年，跟中國大陸的往來關係日益密切，國家意識可能跟澳門地區意識一樣重要，或者更重要。換言之，在不少澳門人看來，認為自己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人並不矛盾，地域認同與國族認同兩者並不衝突。澳門認同是一種地方意識，與中國其他省市的地方意識差異不大，只不過澳門殖民文化的色彩，特別是物質文化遺產的部分，令澳門顯得有些獨特。本文認為，將來的問卷調查可以詢問受訪者出生地，以求得到更多資訊，有助於更深入地探討澳門認同背後的因素與特質。

從受訪者對廣東話與普通話的態度來看，受訪者對廣東話感到高度自豪的比例將近六成，大多高度接受、不抗拒廣東話；相較之下，他們對於普通

話的自豪程度較低，只有三成感到高度自豪。在接受、不抗拒普通話的程度方面，最低度的抗拒約佔五成，比廣東話少兩成。換言之，對廣東話的自豪與接受程度，仍遠高於對普通話的自豪與接受程度。

對語言的態度與澳門認同兩者的關聯性，可以從進一步的推論統計模型中看出來：控制不同的社會人口變項以及態度變項之後，可以看出廣東話與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相關程度最高，愈是對廣東話感到自豪，認同澳門的機率就愈高；相較之下，普通話與澳門認同之間的相關性沒那麼顯著。語言是身份認同的主要載具之一，澳門人在日常生活中說廣東話，較少使用普通話，或者說普通話是公共語言 (*lingua franca*)，是用來與其他語族溝通的，自然會以廣東話自豪。但當普通話的普及工作 (如依香港經驗推行「普教中」) 成為一種政治任務，而廣東話被政府試圖取締時，澳門人會否因而如香港人一般，由此逐漸產生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抗拒<sup>⑤</sup>？本文反映的廣東話和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關係，似乎證明了這一可能。不過，如前所述，澳門人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符號較有自豪感，大多對普通話並不排斥，這種「粵普之爭」在澳門似乎較難形成對立。正如澳門粵語學者鄧景濱指出：「普通話只是其中一種第二語言……不需要對立起來」，「勿把學習語言與政治扯上關係」<sup>⑥</sup>。

主觀社會地位在統計上與澳門人身份認同相關的顯著性次於廣東話，但也是其中一個重要變項。這可能是由於自認為身份地位愈高的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有較高成就，享有較佳的生活條件，對生活地區的滿意度也比較高，因此愈可能認同澳門。我們似乎可以推論：澳門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受訪者，對中國、中共還是有一定的距離感。他們的學歷較高，對民主化應該會有一定的期待，中共的威權統治可能阻礙他們對中國的認同。相對地，從月收入、教育程度、職業來看，似乎月收入較低 (10,000 澳門元以下)、教育程度較低 (小學) 和藍領勞工較喜愛中國，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符號的自豪程度較高。這也和香港人對中國觀感的研究中，低下階層、教育程度較低的受訪者對中國抱持較正面觀感的結論一致<sup>⑦</sup>。對這些中下階層的民眾而言，民生問題可能比公民意識更加重要，他們對特區政府的要求集中在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的議題。例如，澳門特區提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 (即《離補法》)，引發民眾批評與反彈，於 2014 年發動「反離補」大遊行，抗議官員自肥，無視貧富差距與購屋困難等社會經濟問題。即使澳門民間有爭取普選的聲音，也是希望議員與官員能夠重視民眾的聲音與訴求，並不像香港部分社會運動那樣帶有抵抗北京的意涵<sup>⑧</sup>。至於澳門社會中出身背景與身份認同的關係，有待學者作更多關注。

## 五 結論

本文回顧相對稀少的澳門人身份認同研究文獻、分析電話訪問所得之統計資料，並參考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調查機構的民調資料，透過與香港

的比較研究，指出澳門居民身份認同獨特之處。整體而言，澳門受訪者自認為是中國人、有着二元認同並以中國人為主的身分認同比例，都比香港居民高，即使是傾向認同澳門者，也較少對中國元素表示抗拒和排斥。澳門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比香港人高，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符號的接受程度較高，對普通話的抗拒程度也不高。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19年的大灣區澳門居民參與意願調查也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對大灣區居民來澳門旅遊或投資，以及澳門人大灣區工作並不抗拒，只是因生活「環境不合適」而不願意到中國大陸養老；該調查發現，願意到大灣區工作或生活的受訪者和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關係並不顯著<sup>⑤</sup>。為何澳門人不像香港人那樣與中國、中共有相當大的距離感，本土意識也沒那麼強？前文介紹仇國平、邵宗海、李雁蓮與董致麟的研究已經指出幾個可能的原因，未來的問卷研究可以配合這些討論，以求深入探討。

當然，本文也有一些研究限制。第一，樣本有限，統計推論到全體澳門人口的誤差可能性較高；問卷題項中未能問到出生地等問題，無法探討出生地與身份認同的關聯。儘管如此，比起既有的質性研究，我們的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可算是開拓之作。這項探索性研究在此一議題領域算是邁出第一步。我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學者與經費能夠投入此一研究議題。第二，未能採用深度訪談、焦點小組等質性研究法，無法在意義詮釋與歷史脈絡上多所著墨。我們的量化研究也很難與既有的質性研究展開對話。第三，未能探討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議題。雖然土生葡人在澳門人口中的比例不高，但土生葡人在澳門的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中的角色，以及華人如何看待土生葡人，仍待未來有興趣的學者投入研究。

總之，未來研究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或是比較香港人與澳門人身份認同差異的原因，可以從殖民政府的政策（教育、語言）、地方社團與社群關係，以及中央政治權力滲透澳門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掌控新聞傳播媒體與社會團體的策略與方式着手研究，並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切入，比較香港人與澳門人身份認同差異的脈絡與原因。透過量化與質性研究，多方探討澳門人的身份認同議題，有助於我們推動多層次身份認同的研究，探討各種基層認同和意識與國族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本土意識、社會階級、語族、地域（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等）與國族主義、國家認同之間如何相互影響與構成。

澳門人身份認同的研究，也有助於我們擴展澳門學的研究議程，結合澳門既有的政治經濟、經貿產業研究，修正一般人對澳門只有前葡萄牙殖民地、博彩與觀光產業的刻板印象，建構更完整的澳門圖像，讓一般人能更深入地了解澳門的歷史脈絡、社會結構與發展歷程。而且，港澳身份認同的比較研究，也有助於我們探索港澳居民接受「一國兩制」的差異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香港的本土意識比澳門的強烈，部分學者的鼓吹與理論建構固然有相當的影響，但歷史過程、殖民統治、社會脈絡、經貿互動等結構性因素，對港澳身份認同特質與模式的影響，恐怕更重要。

## 註釋

- ① 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號，頁43-58；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3 (1997): 3-13; Lee Ming Kwan, “Hong Kong Identity—Past and Present”, in *Hong Kong Economy and Society: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ed. Wong Siu-lun and Toyojiro Maruy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153-75；王家英、尹寶珊：〈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研究〉，《二十一世紀》，2007年6月號，頁115-27。
- ②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香港城邦論II》（香港：天窗出版社，2014）。
- ③ 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
- ④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圓桌文化，2015）。
- ⑤ 言士：〈由針對「港獨」至打擊「可獨」：「憲政新秩序」的權力擴張〉（2018年1月29日），關鍵評論網，<https://hk.thenewsline.com/article/88646>。
- ⑥ 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行政》，2010年第2期，頁375-78；〈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30-36；張江：〈澳門學與澳門發展〉，《行政》，2017年第4期，頁5-8。
- ⑦ Philip Spencer and Howard Wollman,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58-59.
- ⑧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4-17.
- ⑨ Juan D. Medrano and Paula Gutierrez,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 in Spa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no. 5 (2001): 757-58.
- ⑩ 阿馬羅 (Ana Maria Amaro)：〈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變遷中的土生社會（一項調查的初步結果）〉，《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1994年9月），頁42-76、141-50。
- ⑪ 張虎：〈澳門「土生葡人」問題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1998年第1期，頁42-76；〈澳門「公務員本地化」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1998年第9期，頁5-23。
- ⑫ 周大鳴、李居寧：〈澳門回歸後土生葡人的調適與族群認同〉，《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頁124-38。
- ⑬ 科斯塔 (Francisco Lima da Costa)：〈認同的邊界：葡萄牙籍澳門土生個案的研究〉，《行政》，2006年第1期，頁5-34。
- ⑭ 黎熙元：〈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二十一世紀》，2005年12月號，頁16-27。
- ⑮ Bill K. P. Chou, “Build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East Asia Policy* 2, no. 2 (2010): 73-80.
- ⑯ Lam Wai-man, “Promoting Hybridity: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acau Ide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3 (September 2010): 656-74.
- ⑰ Malte P. Kaeding, “The Evolution of Macao’s Identity: Toward Ethno-Cultural and Civic-based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9, no. 1 (2010): 133-68.
- ⑱ Bill Chou, “Local Autonomy in Action: Beijing’s Hong Kong and Macau Policie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2, no. 3 (2013): 45-48. 前述馬寶康的論文對澳門身份認同的歷史過程與社會結構等因素，也有相關的論述。
- ⑲ 邵宗海、李雁蓮：《從海洋、殖民與移民文化的面向：看澳門與台灣的社群關係比較》（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6），頁120-28、147-48、151。

- ⑳ 董致麟：《中國大陸移民在澳門社會中身份認同之研究，1949-2013》（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頁192-98。
- ㉑ 李展鵬：《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153-99。
- ㉒ 林仲軒：〈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澳門網民的實踐經驗〉，《新聞學研究》，第131期（2017年4月），頁127-71。
- ㉓ Hongyu Wang, "Media Expos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College Youth in Postcolonial Macau", *Issues and Studies* 53, no. 4 (2017): 1-24.
- ㉔ 政府補助金額約15萬元新台幣，考量到電話民調的勞動成本（時薪），樣本最多只能取得351份。
- ㉕ 在我們取得的351份樣本中，扣除不知道的19人與拒絕回答的23人，月收入低於10,000澳門元的有174人，佔樣本的比例為56.31%。根據相關研究，家庭月收入在20,000至50,000澳門元之間，是澳門中產階層的判斷標準之一，個人月收入在10,000澳門元以上，也算是中產階層。換言之，月收入低於10,000澳門元的應該是中低階層。參見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港澳台研究中心、澳門中產階層研究課題組：《澳門中產階層現狀探索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11），頁23。
- ㉖ 參見「澳門研究專頁」，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www.hkupop.hku.hk/chinese/macau/index.html](http://www.hkupop.hku.hk/chinese/macau/index.html)。
- ㉗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揭示最新人口趨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網，[www.byccensus2016.gov.hk/tc/bc-snapshot.html](http://www.byccensus2016.gov.hk/tc/bc-snapshot.html)。
- ㉘ Malte P. Kaeding, "The Evolution of Macao's Identity", 155; Wang Hongyu, "Media Expos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College Youth in Postcolonial Macau", 21.
- ㉙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逾八成人贊成中小學教普通話 對教授簡體字則意見分歧〉（2016年5月3日），[www.hkiaps.cuhk.edu.hk/wd/ni/20170612-114212\\_1.pdf](http://www.hkiaps.cuhk.edu.hk/wd/ni/20170612-114212_1.pdf)，頁4。
- ㉚ 揭仲：〈解放軍進香港「維穩治亂」的設想和代價〉（2019年8月14日），端傳媒網，[www.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15-opinion-jiezhong-pla-hongkong/](http://www.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15-opinion-jiezhong-pla-hongkong/)。
- ㉛ 劉林：〈廣東話 vs 普通話：當香港的語言遇上政治〉（2017年6月29日），BBC中文網，[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439847](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439847)。
- ㉜ 甄梓鈴：〈【澳門人講乜話】回歸19年廣東話「告急」 三文四語之路如何走？〉（2018年6月8日），香港01網，[www.hk01.com/世界說/195885/澳門人講乜話-回歸19年廣東話-告急-三文四語之路如何走](http://www.hk01.com/世界說/195885/澳門人講乜話-回歸19年廣東話-告急-三文四語之路如何走)。
- ㉝ 蕭輝浩、簡浩德：〈中策組研究：逾四成青少年撐泛民 僅5%撐建制〉（2016年4月25日），香港01網，[www.hk01.com/社會新聞/14618/中策組研究-逾四成青少年撐泛民-僅5-撐建制](http://www.hk01.com/社會新聞/14618/中策組研究-逾四成青少年撐泛民-僅5-撐建制)；李立峯：〈逃犯條例修訂，民意到底站在誰的一邊？〉（2019年6月13日），端傳媒網，<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13-opinion-francislee-fugitive-offenders-ordinance/>。
- ㉞ 張仕賢：〈評大陸《一國兩制白皮書》——兼論港澳社會情勢〉，《展望與探索》，2014年第7期，頁12-13。
- ㉟ 〈澳大澳門研究中心公布大灣區澳門居民參與意願調查及網絡意見調〔查〕結果〉（2019年6月27日），澳門大學網，[www.um.edu.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8257/](http://www.um.edu.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8257/)。

王佳煌 台灣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詹傑勝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